



学术研究系列

桐城派十二講

江小角 方盛良 盛险峰 主编

义法雅洁



因声求气



义理考据辞章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学术研究系列

桐城派十二講

江小角 方盛良 盛险峰 主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桐城派十二讲 / 江小角,方盛良,盛险峰主编.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7. 12

ISBN 978-7-5664-1440-3

I. ①桐… II. ①江… ②方… ③盛… III. ①桐城派—文学研究
IV. ①I207. 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90008 号

桐城派十二讲

Tongchengpai Shierjiang

江小角 方盛良 盛险峰 主编

出版发行: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安徽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www. bnupg. com. cn
www. ahupress. com. cn

印 刷: 合肥远东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170mm×240mm
印 张: 14. 25
字 数: 199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2. 00 元

ISBN 978-7-5664-1440-3

策划编辑:杨 序
责任编辑:汪 君 李加凯

装帧设计:李 军
责任印制:陈 如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551—65106311

外埠邮购电话:0551—65107716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551—65106311

要把桐城派研究引向深入

——《桐城派十二讲》序

周中明

我校桐城派研究中心主任江小角教授将《桐城派十二讲》书稿送给我看,托我写篇序。我遵嘱拜读该书稿之后,深感它仿佛在我面前展现出一幅桐城派研究蓬蓬勃勃、争奇斗艳、生机盎然的景象,犹如春风扑面、百花竞放,使我满目生辉;桐城派研究后继有人、人才济济;如同雨后春笋,竞相破土而出、势不可挡。这令我备受鼓舞,不禁为之拍手点赞。

令我感受最深、感到最值得点赞的是,该书具有“四性”的特色:

资料的丰富性。该书作者不仅把视野扩展到过去很少涉及的桐城派作家,从而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新的历史资料,而且对最近十几年来桐城派研究所取得的重大进展和累累成果,皆作了翔实的搜集和列举。这为我们今后把桐城派研究引向深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提供了许多便利。

视野的广阔性。该书不仅以主要篇幅把桐城派作为文派来阐

述,而且把视野扩展到了桐城诗派和桐城学派。在研究对象上,也不再局限于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及姚门四杰、曾国藩及曾门四大弟子,而是扩展到戴、方之前的方以智、钱澄之,与曾国藩同时期或稍后的邵懿辰、孙衣言、刘蓉、孙鼎臣、李元度、俞樾、郭嵩焘、马其昶、高步瀛、李景濂、严修、谷钟秀、籍忠寅、王振尧、邓毓怡、常埜璋、梁建章等过去很少引人注目的桐城派作家。其视野之广,所涉及作家之多,研究领域之深,皆实属罕见,足以制胜。

阐述的概括性。该书虽然只有十二讲,篇幅不长,但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对桐城派研究的方方面面,无论是作家的生平、思想、成就和特色,还是流派的创始、形成、发展和衰落,无不作了概括的阐述和介绍,为我们全面了解和正确评价桐城派,提供了一幅颇为简明扼要、一览尽知的蓝图,堪称要言不烦,弥足珍贵。

见解的新颖性。我尤为赞赏书中《桐城派与清末民初社会变革》这一讲,它列举桐城派与洋务运动、桐城派与维新变法、桐城派与清末新政、桐城派与辛亥革命,以确凿的历史事实,说明在近代中国这些具有进步意义的重大社会变革之中,不少桐城派人物几乎都站在历史进步潮流的前沿,成为引领历史前进的进步力量。如该书指出,吴汝纶弟子谷钟秀“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时受革命派影响而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后,谷钟秀被推选为直隶省的唯一代表参加各省督抚代表联合会,共同商讨临时政府的筹建”“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在国会中担任议员的桐城派弟子便有谷钟秀、籍忠寅、王振尧、邓毓怡、常埜璋、李景濂等人。吴闿生曾评价(他们对于)‘颠覆帝制,建立民国,多与有力焉’”。这对那些无视历史事实而把桐城派人物说成是:“忠心地服务于中国封建社会末代的统治……其思想、政治倾向,显然是封闭、保守、落后甚至是反动的。”(王献永:《桐城文派》第128页,中华书局1992年版。)该是个多么

有力的回击啊！

由于该书具有上述“四性”的特色，所以它就为把桐城派研究引向深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良好的契机。趁该书出版的机会，我想对如何把桐城派研究引向深入，提出管见“五要”：

要更广泛、更深入地搜集有关桐城派的历史资料，做到一切从历史资料出发，使自己的观点和结论建立在实证的基础之上。这是使桐城派研究具有科学性并引向深入的重要前提。例如本书《桐城派与清末民初社会变革》这一讲中，由于作者搜集到有一批桐城派弟子参加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活动的资料，这就有力地证明桐城派人物在政治上有其进步性，揭穿了强加在其头上的所谓“反动的”谎言。又如姚鼐辞官的原因，不少人认为是由于姚鼐与四库书馆内汉学家的学术分歧，而我则认为这是由于他对整个封建官场（当然也包括四库馆）的不满和失望。除了在他的许多诗中早就流露出对封建官场的不满、失望和欲隐退之意外，最有力的证据，是早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二月二十三日，他在与刘大櫆的信中即明言：“自家伯见背之后（指伯父姚范于乾隆三十六年正月八日卒），鼐无复意兴，此间尤无可恋。今年略清身上负累，明年必归。杖履无恙，从此长相从矣。”（姚鼐：《惜抱尺牍》卷一，宣统初元小万柳堂据海源阁本重刊，第1～2页。）此时他尚在任刑部郎中，次年才到四库馆。也就是说，他在到四库馆任职前一年，已经下定“明年必归”的决心。到四库馆后只是延迟一年，与四库馆内汉学家的学术分歧，只是更加坚定了他辞官的决心和行动而已，怎么能成为他辞官的“主要原因”呢？科学的结论，只有建立在充分可靠的实证的基础之上，才能经得起历史事实的检验，才能令人信服。

要认清和把握住桐城派所处的清代是个集大成的时代特征。清代是我国历史上空前大一统的时代，无论在政治、经济或文化、学

术上,皆达到了我国封建社会最辉煌的鼎盛期。桐城派作家对此有敏锐的感受和清醒的认识。因此,他们不是像明代前后七子那样只偏于专宗秦汉或唐宋,而是要“牢笼百代”(姚鼐称赞刘大櫟是“文笔人间刘海峰,牢笼百代一时穷”。见《惜抱轩诗集》卷七《送朱子颖孝纯知泰安府》。)“囿古今而罗万象”(姚鼐:《惜抱轩诗文集》文集卷九,第1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尽收具美,能祛末世一偏之弊,为群材大成之宗者”(姚鼐:《惜抱轩诗文集》第10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如果偏离集大成的时代特色,对桐城派的评论就势必陷入“一偏之弊”;如果过分夸大桐城派崇尚的宋学及其与汉学的矛盾,把他们说成是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的“反动”与“进步”之别。其实,无论宋学或汉学,皆属儒家学派,桐城派绝非反对汉学本身,而是反对某些汉学家的“守一家之偏”“穿凿琐屑,驳难猥杂”“蒐求残阙”“玩物丧志”“专己为名”。至于对汉学本身的主要特征——考证,桐城派作家不但不反对,而且给予充分肯定和热烈赞赏:“以考证断者,利以应敌,使护之者不能出一辞。”(姚鼐:《惜抱轩诗文集》第25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因此姚鼐主张:“义理、文章、考证三者之分,异趋而同为不可废。”“必兼收之乃足为善。”(姚鼐:《惜抱轩诗文集》第104~10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以能兼长者为贵。”(姚鼐:《惜抱轩诗文集》第6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所谓“兼收”“兼长”,就是要互补兼容,相互裨益,集其大成。如果我们不懂集大成的时代特色,也就不可能读懂桐城派和姚鼐,甚至会向他们身上泼污水,或加以种种曲解和非议。

要直面桐城派研究中所提出的种种问题,迎难而上,加以破解。所谓科学研究,就是要发现问题,分析和解决问题。如果对存在的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流于一般的介绍和概述,是难以把桐城派研

究引向深入的。事实上,在桐城派研究中已经提出了很多问题,如桐城派与清代统治者的关系,是否“是以清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和文化政策为直接依据的”?他们的文学作品和文学主张,是否属“为清王朝鼓吹休明的文学”?是否属跟清统治者“一鼻孔出气”的“反动思潮”?在桐城文派、桐城诗派之外,是否还存在桐城学派?桐城学派的内涵和特质是什么?为什么章太炎、郭绍虞都说桐城派崇尚程朱理学只是“门面语”?为什么姚鼐既崇尚程朱理学,又推崇老庄、信奉佛教?又说“鼐于学儒、学佛皆无所得”?对于桐城派作家的作品究竟应如何评价?是否属“在思想内容方面是彻头彻尾为清王朝统治服务的反人民的奴才思想”?“在形式方面是力求模仿古人的极端的复古主义和形式主义”?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的作品最大的特色究竟是“空”还是“丰韵”?是否属“不关心国计民生”?桐城文派、桐城诗派、桐城学派各有什么特色?它们各自形成和发展的路径及相互关系又是如何?桐城派研究的学术史经历过哪些曲折和发展,又有哪些经验和教训?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要作出有充分说服力的论证和回答,殊为不易。别小看那些全盘否定和恣意诋毁桐城派的少数人的意见,他们的来头不小,或出自中科院文学所、北大等高校为教育部统编的教材《中国文学史》,或出自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有不少意见是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提出来的,他们的影响极为广泛和深远,岂能置若罔闻?这是要把桐城派研究引向深入所不可回避的问题。

要直面文本,对方苞、刘大櫆、姚鼐、梅曾亮、曾国藩、吴汝纶等有代表性的桐城派作家作品,作深入、全面、系统的个案研究。要以他们所创作的文本为主要依据,对其所产生的社会背景,作品的思想内容、进步性和局限性、艺术特色或成就,所提出的文学理论主张的具体内涵,对我国古代文论的继承和发展,作家所走的人生道路,

思想的变化和发展,当时的社会思潮、学术思潮对他们的影响等,作深入的研究和具体的剖析,绝不能满足于综合性的概述和一般性的介绍。笔者于2013年5月出版的《姚鼐研究》便是这种尝试之一。如果有更多的人对桐城派主要作家皆作出具体的个案研究,那就势必使桐城派研究深入一大步。

要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科学观点和方法。桐城派能在清代延续二百多年,成为我国历史上历时最长、影响最大、作家人数最多的文学流派,绝不是当权者主观人为的因素所能决定的,这当中必然有其自身存在的合理性。文学的发展,固然不能不受到统治者的影响,但也绝不能忽视其自身相对的独立性,抹杀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文学家既对当权的统治者有依附性的一面,又有其作为历史时代和社会思潮的感官、人民呼声的代言人的特殊性。采用简单化、绝对化、主观武断、形而上学的方法,不仅无济于事,而且危害极大。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性的辉煌功绩彪炳史册,但由于其领导人“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新民主主义论》,第679页。)的观点对我国传统文化所造成的伤害,也不容忽视。有趣的是,后来否定桐城派的观点和说法,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陈独秀的说法如出一辙。如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说桐城派“直与八股家之所谓代圣贤立言,同一鼻孔出气”。(见《新青年》第2卷第6期,1917年2月。)1962年,中科院文学所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说桐城派“他们的思想基本上是和统治者一鼻孔出气”。陈独秀把“归、方、刘、姚之文”说成“其伎俩唯在仿古欺人,直无一字有存在之价值”。(见《新青年》第2卷第6期,1917年2月。)199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刘季高校点的《惜抱轩诗文集》,在其《前言》中则说姚鼐“文章虽多,无一字涉及民

间疾苦者”。两者的腔调甚至字句几乎都一模一样,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之深远。我们必须吸取这个历史教训,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既批判和扬弃其封建性的糟粕,又肯定和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既不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苛求古人,又不对古人恣意美化或拔高,使桐城派研究真正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才能把它引向深入。

俗话说:“事在人为。”《桐城派十二讲》从策划到写作,从宣讲到定稿,从编辑到出版,以江小角教授为首的安徽大学桐城派研究中心的诸位同仁功不可没。今后要把桐城派研究引向深入亦须依赖海内外的桐城派研究者和安徽大学桐城派研究中心诸公的共同努力。我深信桐城派研究必定越来越具有科学性,越来越深入,越来越成熟。让我们伸出双手,以澎湃的热情迎接桐城派研究的春天吧!

是为序。

2017年5月

于安大老校区寓所

目录

第一讲 桐城派开宗立派概说	001
一、桐城派兴起的时代背景	002
二、桐城派兴起的地理人文因素	004
三、方以智、钱澄之的影响	005
四、戴名世、“桐城三祖”与桐城派的确立	009
第二讲 桐城派与清代学术	017
一、概说	017
二、桐城派的学术历程与理路	019
三、桐城派学术研究的开放品格	023
第三讲 桐城派与清代文学	027
一、桐城派与清代古文	027
二、桐城派与清代诗歌	033
三、姚鼐的词作	037
第四讲 桐城派与清末民初社会变革	039
一、桐城派与洋务运动	039
二、桐城派与维新变法	043

三、桐城派与清末新政	047
四、桐城派与辛亥革命	052
五、桐城派与新文化运动	054
第五讲 桐城派研究世纪回眸	058
一、20 世纪 20 至 40 年代的桐城派研究	058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文革”前的桐城派研究	061
三、改革开放以来的桐城派研究	064
四、港、台地区及国外学者的桐城派研究	071
第六讲 戴名世与清前期文化政策	075
一、对朝廷的认同与“君子”的“狂”“狷”	075
二、《南山集》案与清前期的文化政策	081
三、戴名世与桐城派	085
四、余论	087
第七讲 方苞的文论思想与创作特色	091
一、与文墨相伴的坎坷人生	091
二、忠孝亲善、刚直不阿的崇高品格	097
三、忠君爱国、为民请命的政治情怀	101
四、以“义法”说为核心的文论思想	104
五、情真义挚、寓意深远的散文创作特色	110
第八讲 刘大櫟的古文创作及其影响	114
一、坎坷不平的人生道路与幕府生涯	114
二、刘大櫟“神气”说的文论思想	125
三、刘大櫟诗文创作及特点	129
第九讲 姚鼐的文论与诗论	135
一、“道与艺合，天与人一”	135
二、阳刚阴柔	139

三、文之精粗	142
四、义理、考据与辞章	147
五、熔铸唐宋	150
第十讲 曾国藩与桐城派中兴	154
一、曾国藩的人生道路与学术交游	154
二、曾国藩对桐城派的继承与改造	161
三、深受曾国藩影响的作家群体	170
第十一讲 “姚门四杰”与桐城派传播	175
一、“姚门四杰”的形成	175
二、阐发师说,光大本派	181
三、推动桐城派由地方发展至全国	187
第十二讲 “曾门四弟子”与近代文化转型	192
一、以治文教学为事的张裕钊	192
二、兼通新旧、详悉中外的吴汝纶	196
三、致力经世之学的薛福成	201
四、不尽守桐城义法的黎庶昌	205
后记	210

第一讲

桐城派开宗立派概说

中国散文源远流长,理论传统深厚悠久,创作成就更是放射出夺目的光彩。春秋战国历史散文和诸子散文的铺张扬厉,两汉史传文学和政论文的疏宕摇曳,魏晋南北朝抒情散文的沉雄博雅,唐宋八大家古文的明白晓畅,晚明小品文的隽永有味,都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树立起一座座丰碑。清代散文总体成就不及唐宋,就是与同时代的小说戏曲相比,也略为逊色,但它对几千年来的文学带有总结性,为后来新体散文的萌芽作了铺垫和准备,而且作家众多,作品丰厚,题材广泛,体裁多样,比元、明两朝散文更具文学性,其成就不应该被抹杀。

清代文坛,作家如林,成百上千;文章似海,难以数计,但论及清代散文,“天下文章,其出桐城乎”几成定论。马茂元在《桐城派方、刘、姚三家文论评述》一文中说:“自从桐城派成为宗派以来,作家辈出,衣钵相承,历时二百余年之久,即使到了它的后期,也还有卓然自立的名家,作为殿军。”^①这话自然不错,但平心而论,清代散文并非桐城一派的天下。不少经学大师、考据学家的文集中不乏优秀散文,只是其光芒为其学名掩盖;不少才华横溢的遗民文人遁迹山林,

^① 马茂元:《桐城派方、刘、姚三家文论评述》,见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编:《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丛刊》第一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97页。

抒写孤愤,故而文多不传;康熙、乾隆之际,大兴文字狱,查禁“违碍”作品,导致不少散文佳作散佚、湮没,给我们全面描绘清代散文的文学图景带来了困难。此外,清初侯方域、魏禧、汪琬“三大家”的文人之文,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思想家的学者之文,近代龚自珍、魏源的经世派散文,冯桂芬、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改良派“新文体”,在开辟散文新领域、宣传民主思想、反映时代精神、丰富艺术表现手法、革新创造文体等方面,都有桐城派不能企及的地方,至今仍为人们所珍视。

即便如此,桐城派作为清代散文第一大流派的地位,一直为世人所公认。因为除了桐城派外,其他数以千计的作家,几乎都没有开宗立派、独树一帜,这种状况一方面使桐城派一枝独秀,能够以群体的面貌屹立文坛,形成很大的势力和影响;另一方面也促成了它流衍区域的广大和传承时间的久长。振叶寻根,观澜索源,桐城派开宗立派的深广背景和艰难历程值得深究。

一、桐城派兴起的时代背景

桐城派的兴起有其深刻的政治历史和思想文化根源,与当时大的政治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清朝能够入主中原,建立起稳固的统治,其间经历过血与火的战争和残暴的杀戮,给中原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但同时也创造了空前大一统的政治局面,促进了文化的融合、总结与繁荣。清康熙亲政后,剪除异己,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兴水利,减赋税,恢复民力,社会趋于稳定,国力逐渐增强,其主要精力也转向发展社会经济,巩固专制政体,加强思想统治上,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笼络汉族地主阶级以扩大统治基础,而在思想文化方面,采取高压与怀柔相结合的两手政策。一是祭孔庙、谒明陵、旌表明室忠臣,谴责贰臣降将,以此强化以忠君为核心的封建伦理观念,消除传统思想中的“夷夏之防”,引发汉族知识分子思想与情感的共鸣。二是大力提倡程朱理学。清初学者多尚经世之学,讲求实用,但学问再高深,也无助于

所谓的复明大业。随着政治境况的变迁,儒家知识分子入世出仕的初心被激活,许多人再拾《四书集注》,重做八股文章。“清初那几位皇帝,所看见的都是这些人,当然认这种学问便是汉族文化的代表,程朱学派变成当时宫廷信仰的中心”^①。而康熙尤嗜程朱理学,“深谈性理,所著《几暇余编》,其穷理尽性处,虽夙儒耆学,莫能窥测”“尝出《理学真伪论》以试词林,又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书》等书,特命朱子配祠十哲之列。故当时宋学昌明,世多醇儒耆学,风俗醇厚,非后所能及也”^②。由于程朱理学既能使汉族文人满足承继正统儒学的心理,得到某种道德安慰,又有助于八股科考,登科入仕,获得现实利益,因此成为学界主潮,天下趋从。三是提出“清真雅正”的衡文标准。康熙时期理学独尊的文化背景,必然要对古文所言之“义”起规范作用,这一努力起先体现在对科举制艺的要求。“雍正十年,始奉特旨晓谕考官,所拔之文务令清真雅正,理法兼备”^③。“清真雅正”作为一种官方文化政策,得到韩荃、李光地、蔡世远等理学名臣的大力提倡,由时文而推及古文,影响了清初整个文学生态。故方孝岳说:“所谓‘清真雅正’者,即是清初鉴于明末制艺之有流弊,鼓吹这种厘正文体的运动。于是大家体会这种风气,又把它推到其他一切的文学。”^④“清真雅正”的文学思想,一方面通过政府的意志颁发各种文学选本来加以贯彻,另一方面,则是通过兴文字狱等高压措施,消除与“清真雅正”相“悖逆”的文字,防止异端思想的滋生与蔓延。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97页。

② [清]昭槠撰,何英芳点校:《嘯亭杂录》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页。

③ [清]梁章钜撰,陈居渊校点:《制艺丛话·试律丛话》,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3页。

④ 方孝岳:《中国文学批评》,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203页。

正是在这种政治历史和思想文化背景下,桐城派呼应了中国传统散文要求全面总结、形成系统理论的内在要求,因时而变,应运而生。

二、桐城派兴起的地理人文因素

姚鼐曾把桐城文章的独领风骚,归功于桐城具有“天下奇山水也”“山川奇杰之气有蕴而属之”^①。刘开也说:“余观枞阳之地,外江内湖,群山为之左右,峰势喷薄,与波涛互相盘护,山川雄奇之气郁而未泄,土生其际,必有不为功利嗜欲所蔽,而以气概风节显于天下。”^②姚、刘二位皆为桐城人,出于对家乡的热爱,以人杰地灵自矜,可以理解,但把桐城派的兴起,单纯地归结于自然环境的优美,乃不免牵强。天下之大,山清水秀的地方众多,何以出不了像桐城这样的泱泱文派呢?诚然,正如周中明先生所说的,“山水奇秀,促使师法自然、清正雅洁文风的形成”“既开放又封闭的区位,有助于桐城作家的成长”“优美的自然风气,足以吸引外地人才的荟萃”^③。但这些都只是桐城派形成的基础条件之一,事实上,唐宋以后中国经济文化中心的渐次南移,为桐城派的兴起提供了历史契机;元末明初从徽州、浙赣等文化发达地区迁入的大量移民,以及由此形成的众多名门望族,催生了市民社会的成熟和讲学风气的兴盛,为桐城人才群体的涌现奠定了坚厚的物质前提与社会基础。当明王朝定都南京,桐城成为京畿之地,易得风气之先,借助科举考试的台阶,桐城人文在明代中叶后勃然而兴。到了清初风云际会、乱治交接的特定时期,桐城文人纷纷以文济世,展示才情。马其昶在《桐城耆旧传

① [清]姚鼐著,刘季高标校:《惜抱轩诗文集·文集》卷八《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14页。

② [清]刘开撰,徐成志点校:《孟涂文集》卷九《枞阳节孝祠记》,见严云绶、施立业、江小角主编:《桐城派名家文集》第四册,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23页。

③ 周中明:《桐城派研究》,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4~6页。